

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及其与父母教养行为的关系：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

于凤杰 赵景欣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采用追踪设计, 以 948 名初中和高中学生为被试, 在考察早中期青少年对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未来规划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探讨了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预测作用以及青少年行为自主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 (1)在两次测量中, 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增长, 早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变化不显著; 早期青少年的职业探索和投入水平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2)父母的接纳/参与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及以后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 父母的严厉/监督仅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和投入。(3)行为自主在父母的接纳/参与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 未来规划; 探索; 投入; 父母教养行为; 行为自主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对未来的思考与规划是青少年期个体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Nurmi, 1991)。作为从童年走向成年的过渡期, 青少年期是个体集中思考未来和确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 也是未来规划快速发展、分化和拓展的重要时期(Nurmi, 2004)。在这一时期, 个体经历生理、认知和社会角色的新的变化, 需要在教育、职业等领域做出更多的思考与抉择, 以便为进入成人期做好准备。在这一发展背景下, 青少年对未来的合理规划对于其顺利完成从儿童向成人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 青少年合理的未来规划不仅有助于其向成人的良好过渡, 而且也能促进其成年以后的良好发展(Schoon & Parsons, 2002)。

青少年关于未来的思考和规划是以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条件、社会期望和自身发展需要的认识与评价为基础的, 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Massey, Gebhardt, & Garnefski, 2008)。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为青少

年未来规划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多元化、价值观的多样性为青少年思考和规划未来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高校扩招政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从 2000 年到 2010 年高中升学率提高了 10.1%; 教育部, 2012)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如出国留学)等, 使得个体更有信心把接受高等教育纳入未来规划的体系(张玲玲, 张文新, 2008)。另一方面, 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象以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例如, 2007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是 495 万人, 其中有 144 万毕业生处于待业; 新华网, 2007), 也使得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的思考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当前这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模式? 哪些因素能够影响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 影响机制是什么?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丰富国际上关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研究结论, 而且能够为中国青少年的未来规划指导和教育实践提供基本的理论和事实依据。然而,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上述研究问题仍有待于系统的探讨。

收稿日期: 2012-09-07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271105)。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su.edu.cn

未来规划(future planning)是个体对未来建构计划并实现计划的过程(Nurmi, 1991; Seginer, 2009), 是个体同一性发展的关键。一般来说, 青少年在憧憬自己未来的同时, 会逐步确定个人未来的发展目标。然后, 青少年会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个体会通过思考或实际行动来比较不同的方法或途径, 以确定哪些策略或途径对于实现目标更为有效。青少年进行未来规划的过程就是个体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并运用策略实现目标的过程。根据 Nurmi (1991)提出的理论模型, 未来规划包括探索(exploration)和投入(commitment)两个维度。探索是指个体通过征求建议、搜集多方面的信息, 并考虑自身特点与机会空间的匹配, 以便做出有意义的抉择; 投入是指在选择目标的基础上, 个体为实现目标不断地付出时间和精力。青少年对未来的探索和投入有利于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定向, 从而促进自我同一性的获得(Kracke & Schmitt-Rodermund, 2001)。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一致表明, 青少年期个体对未来的探索和投入主要集中在教育和职业领域(Lanz, Rosnati, Marta, & Scabini, 2001; Nurmi, 1991; Seginer, 2009; 张玲玲, 张文新, 周秀琴, 胡艺馨, 王姝琼, 2008)。因此,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通过考察青少年在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来揭示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特点。

个体的未来规划与特定年龄阶段(age-graded)的相关发展任务紧密关联(Massey et al., 2008; Nurmi, 1991; Steinberg et al., 2009), 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特点。当前国际上关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青少年期个体未来规划的发展, 但是对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模式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生理和认知的发展, 青少年对未来的探索和投入增加, 表现出成熟效应(maturation effect; Kalakoski & Nurmi, 1998)。例如, 研究表明 10 年级青少年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水平高于 7 年级(Nurmi, Poole, & Kalakoski, 1996), 大学生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水平高于高中生(张玲玲, 张文新, 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生理和心理成熟的同时, 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例如, 从初中升入高中, 教育环境会发生变化)。青少年会根据所处环境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来调整对未来的探索和投入水平(Massey et al., 2008), 从而表现出未来规划发展的过渡效应(transition effect;

Kalakoski & Nurmi, 1998)。例如, 有关芬兰青少年的研究发现, 在教育过渡背景下, 正面临初中向高中过渡的青少年(9 年级)对未来教育的探索和投入水平以及职业的探索水平高于其他未面临过渡的青少年(7 和 10 年级) (Kalakoski & Nurmi, 1998)。鉴于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 因此关于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更为精细的研究设计来进行深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 已有关于未来规划发展模式的探讨主要是采用横断设计, 该类型的研究设计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未来规划的年龄特点, 但难以精确地揭示其真正的发展模式, 也不能为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稳定性的问题提供很好的解答。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采用追踪设计, 来更为精确地检验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可能存在的成熟效应和过渡效应。

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是一个在较宽泛的人际背景中共同建构的过程(Malmberg, 2001; Massey et al., 2008)。作为影响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重要他人, 父母是青少年在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如学校教育和未来职业)获取支持与建议的主要来源(Seginer, 2009); 并且, 在确定个人未来目标的过程中, 青少年主要从父母那里获得信息(Malmberg, 2001)。因此, 父母如何对待子女、如何与子女沟通等, 即父母的教养行为就成为影响青少年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父母对子女的接纳水平越高, 青少年对职业的探索和投入越多(Seginer, Vermulst, & Shoyer, 2004); 父母对青少年行为监督控制的水平越高, 青少年对未来教育的兴趣则越低(Nurmi & Pulliainen, 1991)。一项对 9 年级青少年间隔半年的追踪研究发现, 父母的接纳和支持会促进青少年半年之后对未来职业的探索(Kracke & Schmitt-Rodermund, 2001)。换言之, 父母的接纳使青少年在未来规划的过程中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支持与建议, 进而能够提升其未来规划的水平; 而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督和控制则会阻碍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然而, 当前关于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未来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 且已有研究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父母教养行为相比, 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行为会伴随较多的严厉、控制, 更强调自身的权威(Chang & Greenberger, 2012; Liu et al., 2005)。中国父母在教养中特别强调“管”, 即强调对子女的监督与控制。在中国父母看来, 对子女的监控和严厉管教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他们应

尽的责任。研究表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严厉管教和行为的控制对青少年的发展未必产生消极影响(Chao, 2001; Liu & Guo, 2010)。例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父母的严厉、监督和控制与青少年较差的学业成绩相关;而在中国,教养严厉父母的子女在学校的表现依然良好(Chao, 1994)。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的教养行为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严厉监督,对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的作用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行为自主是指个体独立进行决策并贯彻这些决策的能力(Steinberg & Silk, 2002, p. 114)。它一般在青少年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开始发展,与青少年的决策和行为紧密关联。一般来说,获得行为自主的青少年在进行决策和行动时,能够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别人征求意见,然后根据自身的判断以及别人的建议,对不同的行为进行权衡,最终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着独立的决断(Petegem, Beyers, Vansteenkiste, & Soenens, 2012)。因此,行为自主的获得意味着青少年独立决策能力的增强以及对个人行为方向的主导性的增加,这可以视为是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心理基础。研究发现,个体的自主能够促进其积极主动地探索外界信息(Koestner, 2008)。同时,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与父母的教养行为紧密关联。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接纳、温情以及对青少年低的心理控制,能够促进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发展(McElhaney, Allen, Stephenson, & Hare, 2009)。由此可以推断,行为自主可能在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的未来规划之间起中介效应。然而,当前这一中介作用机制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 8 年级(在一年半后面升入高中)和 10 年级(已经历升高中的教育过渡)的早中期青少年为被试,采用横断设计与间隔一年半的纵向设计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对如下研究问题进行考察:(1)早中期青少年未来教育和职业规划(探索和投入)的发展是呈现成熟效应还是过渡效应?(2)父母的接纳/参与、严厉/监督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长期的影响效应?这种关联模式是否在青少年早期与中期群体中存在差异?(3)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中是否起中介效应?此外,鉴于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和性别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存在关联(Massey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将把上述变量作为协变量予以控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的五所初中(两所重点中学,三所普通中学)和四所高中(两所重点中学,两所普通中学)选取 8 和 10 年级的学生,第一次测量时共 1020 人,8 年级学生 484 人(男 243 人,占 50.2%),平均年龄为 14.20 ± 0.59 岁,10 年级学生 536 人(男 294 人, 54.9%),平均年龄为 16.35 ± 0.52 岁。其中 52% 的学生来自农村,67.9% 的学生属于独生子女。间隔一年半后,追踪到的有效人数为 948 人,其中 8 年级学生 442 人(男 222 人,占 50.2%;重点中学学生 272 人,占 61.5%),10 年级学生 506 人(男 277 人, 54.7%;重点中学学生 269 人,占 53.2%)。母亲受教育水平在本科及本科以上者占 12.6%,本科以下且高中以上者(含高中毕业生)占 36.3%,高中以下者占 51.1%;父亲受教育水平在本科及本科以上者占 19.5%,本科以下且高中以上者(含高中毕业生)占 35.5%,高中以下者占 45.0%。

卡方检验表明,两次测量中被试在性别、年级、城乡、独生身份等方面的比例分布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的追踪样本与原始样本是同质的。同时,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检验流失被试与追踪被试在前测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流失被试与追踪被试在 T1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父母教养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以及青少年行为自主这些变量上均不存在差异($ps > 0.1$)。

本研究对两次测量数据均有效的 948 人进行统计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规划

采用 Nurmi 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中文版)(张玲玲,张文新,纪林芹, Nurmi, 2006)中的规划过程分问卷对青少年的未来规划进行测量。该问卷在中西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研究中应用广泛,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权威的测量工具(Nurmi et al., 1996; 张玲玲,张文新, 2008)。该问卷分别考察了青少年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规划过程,包括探索和投入两个维度。探索和投入的项目均采用“1”~“5”五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探索和投入的水平越高。未来教育和职业探索分问卷均包括 3 个项目,如“你经常思考或计划自己的学习以及今后要接受的教育吗? ”。两个领域的项目除关键词(即关于哪个领域)外其余表述均相似。两次测量的项目

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职业: 0.67 (T1)、0.69 (T2), 教育: 0.52 (T1)、0.63 (T2)。未来教育和职业投入问卷均包括 4 个项目, 如“毕业后, 你要实现自己未来职业计划的决心有多大”。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教育: 0.61 (T1)、0.69 (T2), 职业: 0.51 (T1)、0.58 (T2)。

2.2.2 父母教养行为

采用 Steinberg, Lamborn, Dornbusch 和 Darling (1992)编制的父母教养问卷(修订版)的中文版(王树青, 张文新, 陈会昌, 2006)中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两个分量表进行测量。接纳/参与维度包括 10 个项目, 严厉/监督维度包括 8 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五点计分, 父母接纳/参与的 10 个项目的选项从“1 非常不符合”到“5 非常符合”, 严厉/监督的 8 个项目的选项从“1 从不允许晚上外出”到“5 想多晚回家就多晚回家”, 或从“1 根本不想知道”到“5 非常想知道”。该量表已经应用于国内外多项研究(Steinberg et al., 1992; 王树青, 陈会昌, 石猛, 2008),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中, 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接纳/参与 0.80, 严厉/监督 0.76。

2.2.3 行为自主

采用 Anderson 等人编制的自主量表(Worthington Autonomy Scale, WAS; Anderson, Worthington, Anderson, & Jennings, 1994)测量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原行为自主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 采用“1”到“4”四点计分, 分数越高代表行为自主的水平越高。本研究首先对这 10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提取原则, 得到四个因子, 其解释率分别为 22.22%、10.88%、10.77%和 10.07%。第一个因子包含 7 个项目, 因子负荷在 0.43~0.63 之间; 第二、三、四因子共包含 3 个项目, 且其中有一个项目在两个因子上存在交互负荷, 本研究将这三个项目删除。因此, 修订后的量表共包含 7 个项目(如“我会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 这 7 个项目的解释率为 30.30%。修订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为 0.60。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在本研究中,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由父亲、母亲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合成, 由青少年报告其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其中父母的职业包括“农民”、“工人”、“医生”、“教师或科研技术人员”、“机关干部或公务员”、“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

人员”、“会计”、“军人”、“个体/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下岗失业人员”、“自由工作者”和“其他(请具体写明)”, 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 “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和“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徐夫真, 张文新, 张玲玲, 2009), 分别赋值“1”~“3”。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六类, 每一类分别依次赋值“1”~“6”。参照有关研究(范兴华,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袁晓娇, 2012), 在统计分析时, 分别将父母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的得分转化成标准分, 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 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SES 变量: $SES = (\beta_1 \times Z_{\text{父亲受教育水平}} + \beta_2 \times Z_{\text{母亲受教育水平}} + \beta_3 \times Z_{\text{父亲职业}} + \beta_4 \times Z_{\text{母亲职业}}) / \epsilon_f$ 。其中, β_1 、 β_2 、 β_3 和 β_4 为因子载荷, ϵ_f 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以合成后分数作为 SES 的指标, 得分越高, 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3 程序

本研究的主试均为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 施测之前, 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专门培训。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每班由两名主试负责, 被试回答完全部问卷后由主试当场收回问卷。第一次施测(T1)是 8 年级(或 10 年级)的上学期, 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测量了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和父母的教养行为; 第二阶段测量了青少年的行为自主。两个阶段的测量在 1 周内完成。第二次施测(T2)为 9 年级(或 11 年级)的下学期, 间隔时间为 1 年半, 测量了青少年的未来规划。

采用 SPSS 13.0 和 LISREL 8.70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特点

在两次测量中, 早期(8 年级组)和中期(10 年级组)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父母教养行为和青少年行为自主的描述统计见表 1。为了考察未来规划(探索和投入)的纵向发展特点, 以及这种发展变化可能存在的发展阶段差异, 分别以两次测量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为被试内变量, 以发展阶段(青少年早期和中期)为被试间变量, 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性别为协变量, 进行四组 2(第一次测量 vs 第二次测量)×2(青少年早期 vs 青少年中期)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教育探索,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1, 944) = 14.52, \eta_p^2 = 0.02, p < 0.001$, 即一年半后,早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显著增长。测量时间和发展阶段的交互效应显著, $F(1, 944) = 6.98, \eta_p^2 = 0.01, p < 0.01$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仅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在一年半后增长显著, $F(1, 503) = 17.17, \eta_p^2 = 0.03, p < 0.001$, 早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增长不显著。发展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05$)。

对于教育投入,测量时间和发展阶段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对于职业探索,发展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1, 944) = 32.48, \eta_p^2 = 0.03, p < 0.001$, 在两次测量中,早期青少年的职业探索水平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以及测量时间和发展阶段的交互

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对于职业投入,发展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1, 944) = 16.29, \eta_p^2 = 0.02, p < 0.001$, 在两次测量中,早期青少年的职业投入水平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以及测量时间和发展阶段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概括来说,两次测量中,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显著升高,早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变化不显著;早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投入水平变化不显著;早期青少年对职业的探索和投入水平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

3.2 早中期青少年的未来规划、父母教养行为、青少年行为自主的相关分析

对未来规划(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父母教养行为、青少年行为自主及人口统计学变量

表 1 早中期青少年在两次测量中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 \pm SD$)

变量	早期青少年		中期青少年		总体	
	T1	T2	T1	T2	T1	T2
教育探索	3.14±0.64	3.18±0.72	2.99±0.65	3.15±0.64	3.06±0.65	3.17±0.68
教育投入	3.85±0.62	3.83±0.67	3.82±0.64	3.77±0.67	3.84±0.63	3.80±0.67
职业探索	3.16±0.71	3.14±0.70	2.87±0.65	2.96±0.65	3.01±0.69	3.04±0.68
职业投入	3.46±0.62	3.43±0.60	3.30±0.55	3.29±0.58	3.38±0.59	3.35±0.60
接纳/参与	3.71±0.65	—	3.56±0.59	—	3.63±0.62	—
严厉/监督	3.82±0.59	—	3.75±0.52	—	3.78±0.55	—
行为自主	3.28±0.39	—	3.21±0.34	—	3.24±0.37	—

注:“—”表示该变量在第二次调查(T2)中未进行测量。 $N=948$ 。

表 2 两次测量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与父母教养行为、青少年行为自主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发展阶段 ^a	1												
2 性别 ^b	0.05												
3 SES ^c	-0.19**	0.03											
4 T1 教育探索	-0.11**	-0.07*	0.12***										
5 T1 教育投入	-0.02	-0.10**	0.22***	0.44***									
6 T1 职业探索	-0.21***	-0.01	0.15***	0.51***	0.33***								
7 T1 职业投入	-0.13***	0.00	0.09**	0.35***	0.47***	0.54***							
8 T2 教育探索	-0.02	-0.10**	0.14***	0.41***	0.35***	0.32***	0.22***						
9 T2 教育投入	-0.04	-0.11**	0.26***	0.33***	0.53***	0.20***	0.26***	0.54***					
10 T2 职业探索	-0.13***	0.01	0.06	0.35***	0.21***	0.43***	0.29***	0.54***	0.30***				
11 T2 职业投入	-0.12***	0.02	0.11**	0.26***	0.32***	0.34***	0.39***	0.40***	0.48***	0.58***			
12 T1 接纳/参与	-0.13***	-0.06	0.21***	0.24***	0.27***	0.15***	0.21***	0.23***	0.30***	0.13***	0.19***		
13 T1 严厉/监督	-0.07*	-0.25***	0.05	0.18***	0.18***	0.07*	0.10**	0.12***	0.12***	0.04	0.05	0.25***	
14 T1 行为自主	-0.10**	-0.02	0.12***	0.22***	0.27***	0.18***	0.23***	0.22***	0.25***	0.22***	0.25***	0.40***	0.16***

注:对发展阶段和性别进行虚拟编码,其中^a早期青少年编码为0,中期青少年为1;^b男生为1,女生为0;^cSES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下同。

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2。由表 2 的相关系数可见, 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投入呈中等程度的相关, 即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呈现显著的跨时间的稳定性(间隔一年半的相关系数在 0.39~0.53 之间, 表 2 中加粗数值)。

由青少年的未来规划与父母教养行为的相关分析可见, 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与两次测量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 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水平越高, 青少年当时及以后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水平会越高。

此外, 青少年的行为自主与两次测量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 以及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均呈显著正相关。

3.3 父母教养行为对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预测作用

3.3.1 父母教养行为对早中期青少年当时的未来规划(T1)的预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 考察父母教养行为对早中期青少年当时的未来规划的预测作用。首先, 为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未来规划的影响, 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性别(虚拟编码, 男生为 1, 女生为 0)为预测变量, 分别以 T1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投入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保留回归分析后的非标准化残差。然后, 以父母的接纳/

参与和严厉/监督为外源变量, 以回归分析后 T1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未来规划(探索和投入)的非标准化残差为内生变量, 建立如图 1 所示的显变量结构模型。

分别对 T1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未来规划建立如图 1 所示的模型, 采用 LISREL 8.70 进行统计分析, 路径分析的结果见表 3。对于教育领域, 在控制 SES 和性别的影响后, 模型的总解释率 $R^2=0.12$, 父母的接纳/参与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和投入($p < 0.001$), 直接效应分别为 0.19 和 0.20; 父母的严厉/监督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p < 0.001$)和投入($p < 0.01$), 直接效应分别为 0.11 和 0.10。对于职业领域, 在控制 SES 和性别的影响后, 模型的总解释率 $R^2=0.06$, 仅父母的接纳/参与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职业探索和投入($p < 0.001$), 直接效应分别为 0.11 和 0.17; 父母的严厉/监督不能预测青少年当时的职业探索和投入。

为了检验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当时的未来规划的关系是否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群体中存在差异, 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 T1 的教育和职业规划路径的发展阶段差异。结果表明, 限制图 1 的四条路径系数等同后, 教育和职业领域的限制模型拟合均良好, 且与非限制模型相比无差异($\Delta\chi^2_s \leq 0.81$, $\Delta df_s=4$, ΔCFI 均为 0), 这说明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当时未来规划的预测的路径系数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即对于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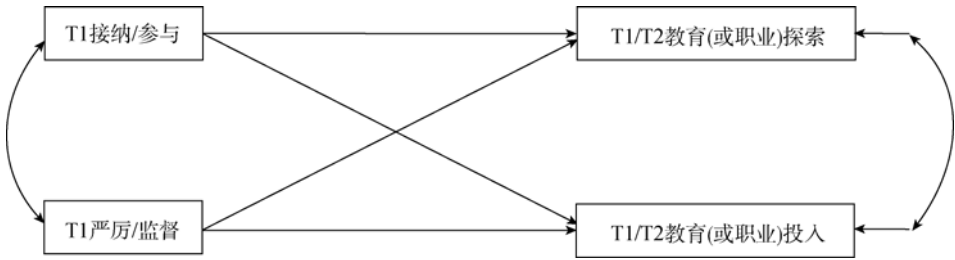


图 1 父母教养行为预测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的模型

注: T1 的教育(或职业)探索和投入均是在控制了 SES 和性别影响之后的非标准化残差; T2 的教育(或职业)探索和投入均是在控制了 T1 的相应领域的探索或投入、SES 和性别影响之后的非标准化残差。下同。

表 3 T1 的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 T1 和 T2 的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的路径系数

自变量→因变量	T1 教育领域		T1 职业领域		T2 教育领域		T2 职业领域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T1 接纳/参与→探索	0.19 (0.03)	0.19***	0.12 (0.04)	0.11***	0.12 (0.03)	0.13***	0.08 (0.03)	0.08*
T1 接纳/参与→投入	0.20 (0.03)	0.20***	0.16 (0.03)	0.17***	0.14 (0.03)	0.16***	0.10 (0.03)	0.11**
T1 严厉/监督→探索	0.13 (0.04)	0.11***	0.04 (0.04)	0.04	0.00 (0.04)	0.00	-0.01 (0.04)	-0.01
T1 严厉/监督→投入	0.11 (0.04)	0.10**	0.06 (0.03)	0.06	-0.03 (0.03)	-0.03	-0.02 (0.03)	-0.02

注: *B* 为非标准化的路径系数, β 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和中期青少年而言, 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当时未来规划的预测模式不存在差异。

3.3.2 父母教养行为对早中期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T2)的纵向预测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 考察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对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T2)的纵向预测作用。首先, 为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以及未来规划的稳定性, 以 SES、性别和 T1 的相应领域的探索/投入为预测变量, 分别以 T2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投入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保留回归分析后的非标准化残差。然后, 以 T1 的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为外源变量, 以回归分析后 T2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规划(探索和投入)的非标准化残差为内生变量, 建立如图 1 所示的显变量的结构模型, 路径分析的结果见表 3。

对于教育领域, 在控制了 SES、性别以及 T1 教育规划的影响后, T1 的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 T2 教育规划的总解释率 $R^2=0.04$, 父母的接纳/参与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之后的教育探索和投入($p < 0.001$), 直接效应分别为 0.13 和 0.16; 父母的严厉/监督不能预测青少年之后的教育探索和投入。对于职业领域, 在控制了 SES、性别以及 T1 职业规划的影响后, T1 的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 T2 的职业规划的总解释率 $R^2=0.02$, 父母的接纳/参与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之后的职业探索($p < 0.05$)和投入($p < 0.01$), 直接效应分别为 0.08 和 0.11; 父母的严厉/监督不能预测青少年之后的职业探索和投入。

为了检验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的纵向关系是否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群体中存在差异, 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路径的发展阶段差异。结果表明, 限制图 1 的四条路径系数等同后, 教育和职业领域的限制模型拟合均良好, 且与非限制

模型相比无差异($\Delta\chi^2s \leq 3.27$, $\Delta df=4$, ΔCFI 均为 0), 这说明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之后的教育和职业规划的预测的路径系数不存在发展阶段差异。即对于早期和中期青少年而言, 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的纵向预测模式不存在差异。

3.4 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相关分析以及 3.3 中父母教养行为预测未来规划路径系数显著的结果, 进一步考察行为自主对二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参照 Baron 和 Kenny (1986) 的程序, 中介效应的存在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路径 c, 本研究中相应的 c 值见表 3); (2) 预测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路径 a); (3) 当同时纳入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进行预测时, 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路径 b), 且此时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减弱(路径 c')。本研究采用 $Z_{sobel} = ab / (a^2 \times S_b^2 + b^2 \times S_a^2)^{1/2}$ 公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式中 a、b 为对应路径 a、路径 b 的回归系数, S_a 与 S_b 分别为 a 与 b 的标准误。

首先, 检验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和职业规划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在 3.3.1 的路径分析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T1 的行为自主), 建立如图 2 所示的中介模型, 路径分析的结果见表 4。其中, 教育领域的中介效应模型为 M1, 模型的总解释率 $R^2=0.16$, 进一步采用 Sobel 检验的方法对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大小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行为自主在父母的接纳/参与与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Z = 3.78$, $p < 0.001$)和投入($Z = 4.59$, $p < 0.001$)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的大小分别为 0.06 和 0.07,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28% 和 35%。行为自主在父母的严厉/监督与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Z = 1.79$, $p > 0.05$)和投入($Z = 1.86$, $p > 0.05$)之间不起中介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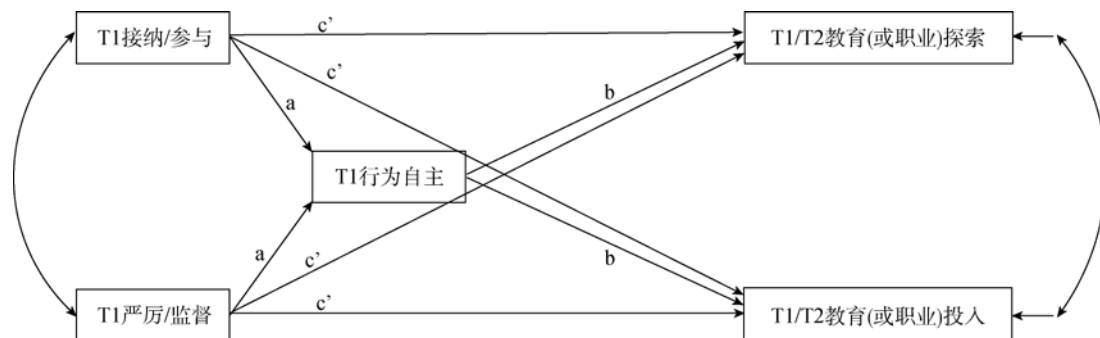


图 2 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图

对于职业领域也建立如图 2 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 M2, 模型的总解释率 $R^2=0.09$ 。基于 3.3.1 的结果, 由于仅接纳/参与对 T1 的职业探索和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 因此表 4 中仅呈现了接纳/参与经行为自主预测职业探索和投入的路径系数。Sobel 检验的结果表明, 行为自主在父母的接纳/参与与青少年当时的职业探索($Z = 3.53, p < 0.001$)和投入($Z = 4.19, p < 0.001$)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的大小均为 0.06,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50%和 38%。

其次, 检验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之后的未来规划(T2)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在 3.3.2 的路径分析基础上纳入中介变量(T1 的行为自主), 参照图 2 的中介模型, 分别建立 T2 的教育和职业领域的中介效应模型 M3 和 M4, 两个模型的解释率 R^2 均为 0.05。由于仅接纳/参与对 T2 的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 因此表 4 中仅呈现了接纳/参与经行为自主预测 T2 的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的路径系数。Sobel 检验的结果表明, 行为自主在父母的接纳/参与与青少年之后的教育探索($Z = 2.75, p < 0.01$)和投入($Z = 2.16, p < 0.05$), 以及职业探索($Z = 3.92, p < 0.001$)和投入($Z = 4.27, p < 0.001$)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的大小分别为 0.04、0.03、0.06 和 0.05,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30%、17%、74%和 57%。

为了检验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是否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群体中存在差异, 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 T1 和

T2 的教育和职业规划的中介路径的发展阶段差异。结果表明, 限制图 2 的八条路径系数等同后, 教育和职业领域的限制模型拟合均良好, 且与非限制模型相比无差异($\Delta\chi^2s \leq 6.38, \Delta df s = 8, \Delta CFI$ 均为 0), 这说明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当时和之后的教育和职业规划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

4 讨论

通过追踪研究设计, 本研究考察了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的年龄特点与发展模式, 探讨了父母的接纳/参与、严厉/监督这两种不同的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的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机制——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为我国当前的青少年生涯规划辅导和教育提供了基本的事实依据。

4.1 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发现, 虽然青少年早期和中期个体的未来规划在间隔一年半的追踪测量中均表现出了中等程度的稳定性, 但是青少年的教育规划和职业规划在两个年龄阶段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教育领域, 本研究对横断数据的分析表明, 青少年早期和中期个体的教育探索和教育投入均无显著变化。纵向数据的分析表明, 在间隔一年半后, 青少年早期和中期个体的教育探索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教育投入水平的变化均不显著。由此可见, 与已有研究所发现的青少年教育探索和教育投入的成熟效应(Kalakoski & Nurmi, 1998; Nurmi et al.,

表 4 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预测青少年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中的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a (Sa)		b (Sb)		c'(Sc')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M1	T1 接纳/参与	T1 教育探索	0.23 (0.02)	0.39***	0.24 (0.06)	0.13***	0.14 (0.04)	0.13***
	T1 接纳/参与	T1 教育投入	0.23 (0.02)	0.39***	0.30 (0.06)	0.18***	0.13 (0.03)	0.13***
	T1 严厉/监督	T1 教育探索	0.04 (0.02)	0.07*	0.24 (0.06)	0.13***	0.12 (0.04)	0.10**
	T1 严厉/监督	T1 教育投入	0.04 (0.02)	0.07*	0.30 (0.06)	0.18***	0.09 (0.04)	0.08**
M2	T1 接纳/参与	T1 职业探索	0.23 (0.02)	0.39***	0.26 (0.07)	0.14***	0.06 (0.04)	0.06
	T1 接纳/参与	T1 职业投入	0.23 (0.02)	0.39***	0.27 (0.06)	0.17***	0.10 (0.03)	0.11**
M3	T1 接纳/参与	T2 教育探索	0.23 (0.02)	0.39***	0.17 (0.06)	0.10**	0.09 (0.04)	0.09*
	T1 接纳/参与	T2 教育投入	0.23 (0.02)	0.39***	0.11 (0.05)	0.07*	0.12 (0.03)	0.13***
M4	T1 接纳/参与	T2 职业探索	0.23 (0.02)	0.39***	0.25 (0.06)	0.15***	0.02 (0.04)	0.02
	T1 接纳/参与	T2 职业投入	0.23 (0.02)	0.39***	0.23 (0.05)	0.15***	0.04 (0.03)	0.05

注: M1、M2、M3 和 M4 均是基于图 2 的中介效应模型而建立的, 即均是由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经行为自主预测未来规划。基于 3.3 的结果中, 对于 T1 的职业规划、T2 的教育和职业规划, 仅接纳/参与起显著预测作用, 因而, 对于 M2、M3 和 M4 模型, 该表仅呈现了父母的接纳/参与预测相应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的路径系数。

1996; 张玲玲, 张文新, 2008) 和过渡效应 (Kalakoski & Nurmi, 1998) 不同, 本研究的早中期青少年样本对教育的投入水平比较稳定, 教育探索水平虽然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出现了增长, 但是从青少年早期到中期相对稳定。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顾明远, 2004), 在中国当前应试教育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背景下 (闫守轩, 韩玲玲, 2011), 无论是迫于外在压力, 还是源自内在的需求, 处于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都需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因此表现出了稳定的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同时, 虽然早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并没有表现出过渡效应, 但是在环境要求其做出抉择时会有所波动。由于高中生在高二时要面临文理分科, 因此他们在征求建议、搜集信息和考虑自身特点的基础上, 需要对学习文科还是理科做出抉择; 初三的学生则会因义务教育阶段的结束而面临继续读高中、读职业学校还是就业等选择。因此, 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 高二(11 年级)的教育探索水平显著高于高一(10 年级); 虽然初二(8 年级)和初三(9 年级)的教育探索水平差异不显著, 但这一时期个体的教育探索水平呈现出增长趋势。无论是已有研究发现的过渡效应, 还是本研究中教育探索随环境的波动、高水平教育投入的相对稳定, 这些都反映了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会受到与特定历史时期年龄相关的发展任务、社会期望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Nurmi, 2004; Nurmi, Poole, & Seginer, 1995)。

在职业领域, 青少年的未来规划表现出了显著不同于其教育规划的发展模式。横断分析的数据表明, 早期青少年的职业探索和投入水平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 但是, 纵向数据的分析表明,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无论是青少年早期还是中期个体的职业探索和投入水平平均没有显著变化。根据动机的生命全程理论 (life-span model of motivation, Nurmi, 2004; Salmela-Aro, 2009), 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与年龄相关的社会机会、要求和期望引导着人们对未来目标的建构与规划。在我国, 初中和高中的教育任务有所不同, 因此社会对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期望乃至青少年对自身的期望和未来规划在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差异。一般来说, 作为义务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 初中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承前启后, 既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 又要为社会建设输送合格的劳动者 (何善平, 2000); 而受“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 高中教育则主要致力于为高一级院校输送人才

(卢立涛, 2007)。换言之, 初中阶段的结束意味着初中生要面临着继续接受教育还是走向就业的第一次分流, 这一背景使得部分初中生 (尤其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开始进行高水平的职业探索和投入; 而高中生的首要任务是参加高考, 当前大学入学率的提高, 使得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多数高中生可以实现的目标 (张玲玲, 张文新, 2008), 这就让大部分的高中生相对忽略对职业的探索和投入, 而着力于对教育的投入。

由此可见, 在本研究中, 早中期青少年对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未来规划表现出了与西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模式, 已有研究提出的成熟或过渡效应并不足以概括本研究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特点。这提示, 青少年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其未来规划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Nurmi, 2004; Nurmi et al., 1995)。根据发展情境论 (Lerner, 2002), 青少年的发展是个体与其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 要描述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特点, 不仅要考虑其年龄特点, 更要了解其面临的发展任务和社会期望。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更长期的追踪设计和跨文化研究, 以全面了解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趋势以及文化差异性。

4.2 父母教养行为与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 父母教养的接纳/参与正向预测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的规划, 严厉/监督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教育规划; 且父母教养行为对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预测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 即对于早期和中期的青少年群体而言, 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模式是相同的。

本研究发现, 父母的接纳/参与在总体上对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预测力最强, 既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 而且在控制了第一次测量的未来规划后, 依然能够预测青少年一年半后对这两个领域的规划。这不仅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 (Kracke & Schmitt-Rodermund, 2001; Nurmi & Pulliainen, 1991; Seginer et al., 2004), 而且为父母的接纳/参与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父母高水平的接纳/参与表达了对青少年的认可, 为青少年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提供了温暖、支持和具有安全感的环境 (Umaña-Taylor & Guimond, 2010), 这在促进青少年当前及以后对个人未来进行探索的同时, 也为青少年对实现未来目标而进行的投入提供了信心。这

启示, 父母应更多地接纳青少年的行为并积极参与到其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会有助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 进而促进其向成年期的顺利过渡。

与西方研究所得出的父母的监督控制会降低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兴趣的研究结果(Nurmi & Pulliainen, 1991)不同,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严厉/监督对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具有即时性影响, 表现为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和投入。由此可见, 中国父母的严厉/监督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模式表现出文化特异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青少年对同一种父母教养行为的认知存在差异(Steinberg, 2007)。与西方青少年不同, 中国青少年认为父母的严厉、监督并不是消极的, 而往往包含着温情和关爱(Chan, Bowes, & Wyver, 2009), 是父母对子女负责任的表现, 所谓“打是亲, 骂是爱”。因此, 父母的严厉和监督对本研究样本的未来规划并没有消极影响, 相反还促进了青少年当时的未来规划。然而, 与父母的接纳/参与不同, 父母的严厉/监督仅对青少年当时的教育规划有预测作用, 不能预测青少年之后的教育规划, 即父母的严厉/监督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时性, 且只对教育规划——青少年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发展任务有影响。这表明, 中国父母的严厉/监督虽然对青少年的未来规划有促进作用, 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即时性的, 并没有表现出长期效应。

4.3 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探讨了父母教养行为影响青少年未来规划的机制问题, 并预期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中介模型路径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了这一中介效应, 而且多组比较的结果表明, 这一中介效应模型对于早期和中期的青少年群体均不存在差异。

在本研究中, 无论是在同时性的还是在纵向的关系模式中, 父母的接纳/参与对青少年教育和职业的规划的预测均部分地通过行为自主起作用。可见, 父母的接纳/参与促进了青少年的自我管理水平和独立做决策的能力(McNamara, Selig, & Hawley, 2010), 进而提高了其对未来进行探索和投入的水平。同时,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的行为自主在父母的严厉/监督对青少年当时的教育规划的预测中不起中介效应。采用高水平严厉/监督教养的父母往往对子女有较明确的行为规范和要求, 伴随着对子女较高的期望, 而且他们对子女的管束也相对较多(Chan et al., 2009); 相应地, 他们的子女在规

划未来教育时会更多采用或依照父母的期望与标准, 即父母的严厉/监督可能具有相对直接的、即时的效应。另外, 在父母的严厉/监督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中, 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 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 不同研究者对行为自主的界定存在差异, 不同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有的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的自主是一种人际结构, 他们通过考察家庭中的决策制定或父母对青少年的控制程度来测量自主(见 McElhaney et al., 2009)。也有研究者将自主看作是个体的一种品质特征, 这类研究的测量指标一般包括青少年的分离一个体化、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独立性等内容(Noom, Deković, & Meeus, 2001)。本研究主要关注了青少年行为自主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等方面的内容。鉴于青少年行为自主内容的丰富性, 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考察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其他方面在青少年未来规划发展中的作用。

此外,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自主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 鼓励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观往往被看做是个体主义文化的一部分(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和对权威的尊重。尽管不同文化在强调自主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会存在差异, 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文化都强调自主是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Liu, Chen, Zheng, Chen, & Wang, 2009)。因此, 在不同文化下, 个体行为自主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或者自主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异。与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存在文化特异性相类似, 行为自主的作用也可能存在文化差异性, 这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行为自主的影响, 以探讨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性。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即时和纵向影响, 但是仅关注了早中期青少年。未来研究需要以更宽泛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为被试, 进一步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研究的所有数据均由青少年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效应, 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多种手段收集数据, 如采用父母报告的方法收集父母教养行为的数据等, 从而进一步减小方法效应的影响, 使得到的结果更加可靠。此外, 本研究仅关注了行为自主在父母教养行为影响青少年未来规划中的作用, 对

于一些可能影响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未来规划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并未涉及,如个体的认知评价、亲子间对青少年未来发展的沟通等,有待研究者同时对这些可能的中介变量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全面理解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机制。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在间隔1年半的追踪测量中,早中期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呈中等程度的稳定性。青少年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且发展模式存在发展阶段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两次测量中,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水平增长显著,早期青少年的教育探索变化不显著;早中期青少年的教育投入水平无显著变化;早期青少年对职业的探索和投入水平均高于中期青少年。

(2)父母的接纳/参与和严厉/监督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独特预测力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父母的接纳/参与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及以后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严厉/监督仅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和投入。

(3)青少年的行为自主部分中介父母的接纳/参与与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规划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Anderson, R. A., Worthington, L., Anderson, W. T., & Jennings, G. (1994).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nomy scale.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6(4), 329-345.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Chan, S. M., Bowes, J., & Wyver, S. (2009). Chinese parenting in Hong Kong: Links among goals, beliefs and style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79(7), 849-862.
- Chang, E. S., & Greenberger, E. (2012).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t midlife among European- and Chinese-American mothers with a college-enrolled child.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4), 1-12.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 Chao, R. K. (2001). Extending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parenting style for Chinese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Child Development*, 72(6), 1832-1843.
- Fan, X. H., Fang, X. Y., Liu, Y., Lin, X. Y., & Yuan, X. J. (2012). 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ident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among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5), 647-663.
- [范兴华,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袁晓娇. (2012).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 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心理学报*, 44(5), 647-663.]
- Gu, M. Y. (2004).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Chinese education.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9.
- [顾明远. (2004).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9.]
- He, S. P. (2000). On "penet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Journal of Sh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6(1), 24-26.
- [何善平. (2000). 论在初中“渗透”职业教育.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16(1), 24-26.]
- Kalafoski, V., & Nurmi, J. -E. (1998).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related to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famil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8(1), 29-47.
- Koestner, R. (2008). Reaching one's personal goals: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focused on autonomy. *Canadian Psychology*, 49(1), 60-67.
- Kracke, B., & Schmitt-Rodermund, E. (2001). Adolescents' career explo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In J. E. Nurmi (Ed.), *Navigating through adolescence: European perspectives* (pp. 141-165). London, England UK: Routledge Falmer.
- Lanz, M., Rosnati, R., Marta, E., & Scabini, E. (2001). Adolescents' future: A comparison of young people's and their parents' views. In J. -E. Nurmi (Ed.), *Navigating through adolescence: European perspectives* (pp. 169-197).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Lerner, R. M. (2002).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3rd e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Liu, M. W., Chen, X. Y., Rubin, K. H., Zheng, S. J., Cui, L. Y., Li, D., ... Wang, L. (2005). Autonomy- vs. connectedness-oriented parenting behaviors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mot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9(6), 489-495.
- Liu, M. W., Chen, X. Y., Zheng, S. J., Chen, H. C., & Wang, L. (2009). Maternal autonomy- and connectedness-oriented parenting behaviors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rs in China. *Social Development*, 18(3), 671-689.
- Liu, M. W., & Guo, F. (2010).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child behaviors in Canada and Chin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2), 109-114.
- Lu, L. T. (2007). A global view of the natur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34, 35-38.
- [卢立涛. (2007). 全球视野下高中教育的性质、定位和功能. *外国教育研究*, 34, 35-38.]
- Malmberg, L. E. (2001). Future-orient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ntexts. In J. -E. Nurmi (Ed.), *Navigating through adolescence: European perspectives* (pp. 119-140). London, England UK: Routledge Falmer.
- Massey, E. K., Gebhardt, W. A., & Garnefski, N. (2008). Adolescent goal content and pursui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16 years. *Developmental Review*, 28, 421-460.

- McElhaney, K. B., Allen, J. P., Stephenson, J. C., & Hare, A. L. (2009). Attachment and autonomy during adolescence. In R. M. Lerner, & L. Steinbe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pp. 358–403).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McNamara, K. A., Selig, J. P., & Hawley, P. H. (2010).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patterns and child behaviour and social recep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0(9), 1185–1202.
-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Promotion Rate of School Graduates in 2010*. [教育部. (2012). 2010 年各级学校毕业生升学率.]
- Noom, M. J., Deković, M., & Meeus, W. (2001).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f adolescent autonom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5), 577–595.
- Nurmi, J. -E. (1991).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11, 1–59.
- Nurmi, J. -E. (2004). Socializ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Channeling, selection, adjustment and reflection. In R. M. Lerner & L. Steinbe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pp. 85–124).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Nurmi, J. -E., Poole, M. E., & Kalakoski, V. (1996).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identity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i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443–452.
- Nurmi, J. -E., Poole, M. E., & Seginer, R. (1995). Tracks and transitions—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 future-oriented goals, explorations, and commitments in Australia, Israel, and Fin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0(3), 355–375.
- Nurmi, J. -E., & Pulliainen, H. (1991). The chang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and intelligence as determinants of 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4, 35–51.
-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 Salmela-Aro, K. (2009). Personal goals and well-being during critical life transitions: The four C's-Channelling, choice, co-agency and compensation.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4, 63–73.
- Schoon, L., & Parsons, S. (2002). Teenage aspirations for future careers and occupations outcom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0, 262–288.
- Seginer, R. (2009). *Future orientation: Developmental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Springer.
- Seginer, R., Vermulst, A., & Shoyer, S. (2004). The indirect link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A multiple-step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4), 365–378.
- Steinberg, L. (2007). *Adolescence* (8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Steinberg, L., Graham, S., O'Brien, L., Woolard, J., Cauffman, E., & Banich, M. (2009). Age differences in future orientation and delay discounting. *Child Development*, 80(1), 28–44.
- Steinberg, L., Lamborn, S. D., Dornbusch, S. M., & Darling, N. (1992). Impact of parenting practices on adolescent achievement: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chool involvement, and encouragement to succeed. *Child Development*, 63, 1266–1281.
- Steinberg, L., & Silk, J. S. (2002). Parenting adolescents. In M.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1. Children and parenting* (2nd ed., pp. 103–128). Mahwah, NJ: Erlbaum.
- Umaña-Taylor, A. J., & Guimond, A. B. (2010).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predicting Latino adolescents'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3), 636–650.
- van Petegem, S., Beyers, W., Vansteenkiste, M., & Soenens, B. (2012).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autonomy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Examining decisional independence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1), 76–88.
- Wang, S. Q., Chen, H. C., & Shi, M. (2008). Adolescent ego identity status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arenting authoritativeness and identity styl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4(2), 65–72.
- [王树青, 陈会昌, 石猛. (2008).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发展及其与父母教养权威性、同一性风格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4(2), 65–72.]
- Wang, S. Q., Zhang, W. X., & Chen, H. C. (2006). Development of ego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s to parenting style an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4(2), 126–132.
- [王树青, 张文新, 陈会昌. (2006). 中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4(2), 126–132.]
- Xinhuanet. (2007). This year 3.51 mill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employed, and the employment to grassroots increases. Retrieved October 26, 2007,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0/26/content_6948697.htm
- [新华网. (2007). 今年 351 万大学生实现就业到基层就业人数增加. 2007-10-26 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0/26/content_6948697.htm]
- Xu, F. Z., Zhang, W. X., & Zhang, L. L. (2009).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adolescents' alienation: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12), 1165–1174.
- [徐夫真, 张文新, 张玲玲. (2009).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41(12), 1165–1174.]
- Yan, S. X., & Han, L. L. (2011). A perspective view of the separation of art and scientific subjects in high school based on the new reform plan for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test.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2), 66–69.
- [闫守轩, 韩玲玲. (2011). 从高考改革新方案透视高中文理分科. *教育学术月刊*, (2), 66–69.]
- Zhang, L. L., & Zhang, W. X. (2008). Personal future planning in middle and late adolesc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adolescents' communications with parents and friend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5), 583–592.
- [张玲玲, 张文新. (2008). 中晚期青少年的个人规划及其与亲子、朋友沟通的关系. *心理学报*, 40(5), 583–592.]
- Zhang, L. L., Zhang, W. X., Ji, L. Q., & Nurmi, J. -E. (2006).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2(1), 103–108.
- [张玲玲, 张文新, 纪林芹, Nurmi, J. -E. (2006). 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中文版的测量学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1),

103–108.]

Zhang, L. L., Zhang, W. X., Zhou, X. Q., Hu, Y. X., & Wang, S. Q. (2008). Future oriented goals and fears among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4(4), 50–55.

[张玲玲, 张文新, 周秀琴, 胡艺馨, 王姝琼. (2008). 普高生与中职生的个人未来目标和担忧. *心理发展与教育*, 24(4), 50–55.]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Planni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Parenting Behaviors During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c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Behavioral Autonomy

YU Fengjie; ZHAO Jingxin; ZHANG Wen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individuals' thinking and behavior is that they are future-oriented. Future planning, a process that involves constructing plans and realizing these plans,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y researchers according to two dimensions, i.e.,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future plann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many aspects of adolescents' current and later adjust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the notions of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researche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adolescents' future planning in specific cultural and/or social contexts, especially in those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ith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Howeve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was conducted in Western cultures and research on how contemporary Chinese adolescents plan for their future has been rare. Methodologically,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were mainly based on studies of cross-sectional design, resulting in very limit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s of future planning with age. Besides, family is the more proximal context that is salient for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in what ways that parenting behaviors influence adolescents' future planning and whethe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and future planning are mediated b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utonomy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of interest.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planning, the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ture planning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the possible mediating role of behavioral autonomy in the associations with a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Using a short-term longitudinal design, a total of 948 adolescents (499 males, 449 females) of grades 8 and 10 attending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respectively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a period of one and a half years. At Time 1, those adolescents completed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assessing future planning (i.e.,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parenting behaviors (i.e., acceptance/involvement and strictness/supervision), and behavioral autonomy. A year and a half later, at time 2, they completed the future planning questionnaire again.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future planning for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varied between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ts. While middle adolescents reported increased exploration for education with ag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for early adolescents. Both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ts report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uture education, and their exploration for and commitment to future occupation between Time 1 and Time 2. Early adolescents reported

more exploration for and commitment to occupation than middle adolescents at both Time 1 and Time 2. (2) At Time 1, for both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ts, parental acceptance/involvement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future planning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in a positive way, whereas parental strictness/supervision only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 exploration for and commitment to future education.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future planning at Time 1, parental acceptance/involvement still positively predicted future planning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at Time 2; parental strictness/supervision did not predict adolescent future planning longitudinally. (3) Adolescents' behavioral autonomy served to partially mediate the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cceptance/involvement and future planning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future planning was shaped by the specific culture and age-graded tasks, which further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future planning is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future planning; exploration; commitment; parenting behavior; behavioral autonomy